

人物关注

沈弘：
在西方影像里找寻中国历史



自2014年起，沈弘陆续编译、出版《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》，已推出七卷，呈现了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从晚清至民国期间对中国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风貌的报道。沈弘很早就有一个观点——图像证据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像我们上法庭打官司，有好东西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，但图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作为比较重要的证据。在棕褐色、两层高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里，当学者沈弘翻看、整理美国企业家哈里·福勒·伍兹留下的1905年访华老照片时，感受到历史惊人的相似性。2012年，沈弘与美国总统塔夫脱家族的后人合著《看东方：1905年美国代表团访华之行揭秘》，用250张老照片还原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大事件。

(人物周刊)

王锡荣：与鲁迅隔空对话



初识鲁迅，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鲁迅只是课本里时常出没的文学符号；再读鲁迅，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孔乙己、祥林嫂、闰土……鲁迅是以笔为刀，解剖国民灵魂的精神斗士；再观鲁迅，才知道他设计、多幽默、善交友，也有可爱的一面。10月21日，鲁迅文化基金会与上海图书馆共同举办了“大师对话”讲坛，与鲁迅隔空对话，特邀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、鲁迅文化基金会首席专家王锡荣教授跨越时代桥梁，从鲁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角色出发，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，一个立体、鲜活的人。王锡荣认为，鲁迅的灵魂一边是呐喊，一边是彷徨。他“骂人”，他批判，他敢于发声；他也苦闷，有思考，有人称他是“20世纪中国最苦痛的灵魂”。然而承载这样深切痛苦灵魂依旧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”。

(文汇报)

迟子建：烟火人间，温情漫卷



晨曦时分的花香馥郁，澡堂子的湿气氤氲……9月，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《烟火漫卷》出版发行。她以生活了30年的哈尔滨为主体，用文字刻画烟火气息中丰富的生活图景，描写了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的命运。一座自然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，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，于“烟火漫卷”中焕发着勃勃生机。”跟随她的笔触，感悟哈尔滨这座城中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，以及她笔下那些普通人的命运交响曲。“说《烟火漫卷》写的是城市，也不尽然。当一种题材孕育成熟要喷涌为作品时，辐射半径也许会超过作者的预期。书里有很多笔墨写到水路客运终止的七码头，写到黑龙江东部的一座山城；而书中的角色，黄娥和翁子安，又有哪个是哈尔滨人呢？但没有他们的参与，书中的哈尔滨也少了色彩。”迟子建表示。

(人民网)

大洋深处追船人

□ 本报记者 陶相银



纪录片导演井建民在远洋渔船上进行拍摄。(资料片)

动力再次熄火。因为船触底时，泥沙进入冷凝系统，导致水流不畅，继而导致发动机因温度过高而爆缸。大洋深处失去动力意味着什么？“如果海上起风，任何一个较大的浪，都会将渔船置于危险境地。”井建民和同事们一夜未眠，“周边全是未知的世界，一切都浩瀚莫测，感觉危险如影随形”。

“鲁威远渔919”发出了求救信号，次日早上，“鲁威远渔909”赶到，用一根粗壮的缆绳拖着“鲁威远渔919”继续前行，而“鲁威远渔919”边走边修，直到2月3日才恢复正常。

2月6日，“鲁威远渔919”终于与“鲁威远渔979”在大洋相会。在风浪的颠簸中，两船缓慢靠近，在相距不足10米后各自抛缆绳相互靠船，船头高大的吊机探出长臂，摄影师们坐在一个大网兜里被吊上了“鲁威远渔979”。

初上“鲁威远渔979”，井建民说：“有种终于回家的感觉。”但在第二天，他和所有人一样，“想家想得想哭。”2月7日，是除夕。井建民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祖国，也是平生第一次没跟父母一起过年。”

这天晚上，大家一动手，包了饺子，炒了几个菜，还搬出了啤酒。为了保证生产安全，船员只被允许在除夕当天适量饮酒，且只能是啤酒。举杯、唱歌、祝福，喧闹营造出热烈的氛围，谁都不愿停下来，一旦安静下来，肯定会有哭声响起。

年夜饭吃完，船长带着船员们来到甲板，冲着祖国的方向磕了几个头，尽管家乡此时才是除夕的早晨。

远洋生活——

只有“将就”，没有“讲究”

远洋渔业的作业过程是极为劳累的，往往要持续整夜。船员们原本6小时一班，在渔汛好的时候，需要全员连轴转，休息也只能是就地歇一会儿。摄制团队成员的生物钟也随之处在相对混乱的状态。

“船员都是小跑着干活，空间有限，我们几乎没法跟拍，也没法按照理想的角度去拍摄；风浪声和机器声太大，收音效果非常差；船一直在颠簸，镜头没法稳定……”困难太多，但拍摄不能停，井建民只能想各种方法克服，“让船员帮我们焊接了几个拍摄辅助工具，把摄像机伸到接近海平面的位置拍摄。风浪大的时候，要把三脚架用绳子固定，将摄影师捆在围栏上，还需要另外两人每人拴着一根安全绳抱住摄影师帮他保持平衡”。

南大西洋是地球上最为狂野的海洋，狂风巨浪三天两头就来一次。“站在甲板上，你会感觉船正一头向水下扎去，继而猛地一抬头，发现又在往上冲。”这也使摄影师们持续处于晕船状态。而很多场景都是摄影师在眩晕的状态下拍摄的，有时候为了拍摄效果，会选择一些特殊的角度取景，例如船帮外的镜头，这需要摄影师将身体探出船舷，虽然绳索可以确保安全，但这种危险动作考量的却是心理承受能力，“滔天巨浪翻滚而来，就像马上拍到头上一样……”

为防止摄影器材被海水腐蚀，拍摄时必须把摄像机包裹起来。三脚架三天两头需要修理，否则拉不动枪。“湿度、盐度太大”。远洋渔船上生活从没有“讲究”一说，一切都是“将就”。摄影师们的床铺跟船员们一样，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内要住4人，上下铺。房间下方就是冷库，原本就潮湿的房间更显阴冷。“下铺就是在地板上铺泡沫板，直接睡在泡沫板上。如果不是每天拿电褥子烘一烘，就跟睡在冰块上一样。”船长有住单间的待遇，也不过五平方米，一床一桌一橱而已，且紧靠驾驶室，便于他时刻去掌舵。

至于个人卫生，也没人在意，洗脸、刷牙这种日常生活程序，被很多人压缩成好几天一次。船上有海水淡化设施，淡化水不仅不好喝，还限量使用。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到甲板上洗澡，“都是老爷们，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，从海里打海水冲澡，之后

用淡化水一冲就完事。”洗衣服、洗被褥的方式更为奇特——用绳子拴住衣物，扔进海里，绳子系在船尾，任由衣物在海里冲洗一两天，之后拿来用淡化水一泡，再晾干即可。

在远洋渔船上，笔记本电脑是必需品，不论新旧，不讲配置高低，只要硬盘足够大，能看视频即可。硬盘里堆满了下载或拷贝来的影视剧、小品、相声等一切可以缓解精神压力的视频。

吃，在船上也只能发挥它的基本功能——“饱了就行”。为了便于保存，船上吃的都是冻菜，蔬菜被切碎装进筒状塑料袋内再冷冻起来的那种。“炒、炖都一个味，做熟了就吃，更何况这里除了鱼腥味也没有别的味道。”井建民说，他们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C的办法就是泡茶吃柿子，“柿子是冷冻保存的，拿出来就吃，一个能啃半天”。

船上唯一的绿色来自后甲板的一个“蔬菜大棚”，这是轮机长用泡沫箱种的“自留地”，一共也没成活几棵菜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嘴馋的时候才有权薅几根绿苗吃，“青菜在渔船上也是奢侈品”。

除了承受劳累和艰辛，远洋船员也跟社会隔离。“鲁威远渔919”的二副徐龙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9年，“人都锈住了”，30多岁的他连微信都不会用。

远洋渔船上的高薪和现实生活的压力，促使他们涉足茫茫大洋。“鲁威远渔979”上有对双胞胎兄弟，弟弟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7年，哥哥却是大学生，因创业失败跟弟弟到远洋渔船上“挣大钱”。而船长于传荣已经在远洋船上干了十几年，他的两个哥哥则在另一艘远洋渔船上谋生活。

“他们是在狂风巨浪、无常天气、摇晃世界里生存的劳动者，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一样丰富，他们对生活和我们一样抱有美好的期待。在他们身上，勤劳、勇敢、坚韧这些优秀品质体现得尤为突出，他们愿意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，去从事这样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艰辛工作。”井建民说，“平凡和伟大并不矛盾，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这个时代最普通的样本，我敬佩他们。”

理想未竟——

从“打死不去”到“必须再去”

渔汛极差，“鲁威远渔979”在南大西洋作业5个多月，才打了150吨鱿鱼，而这个数字是2015年两三天渔获量。这也使得原定的返程计划一拖再拖。

2016年4月16日，10级强风裹挟着7米巨浪而来。“鲁威远渔979”不得不全速北上，以躲避风浪。借此机会，摄制团队将被送回陆地。5月13日，“鲁威远渔979”驶抵乌拉圭的一处外锚地，当看见陆地的那一刻，井建民兴奋地张大嘴说不出话，环顾四周，他发现所有人都是如此。此时，井建民内心又重复了一遍“打死也不会再去大洋上了”。

摄制团队如愿回到了陆地。而“鲁威远渔979”上的船员们不能靠岸，渔船再次起锚，前往秘鲁附近海域继续作业。按照劳动合同，这些远洋船员必要要在海上工作满两年才能上岸。在南大西洋漂浮4个月，井建民瘦了20斤，在无尽的恐惧中他也多次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。回到威海后，井建民像是得了抑郁症，经常关掉手机把自己锁在屋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“就是发呆，什么都不想干。”他原想尽快把片子剪辑出来，但一看到那些画面就忍不住哭，其他摄影师亦是如此，井建民说：“零距离接触对这帮船员的感受太深了”，剪辑工作不得不在三四个月后才展开。每当有朋友前来探望，井建民会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念叨“好好过日子”。

300多个小时的素材最终被剪辑成90分钟，题目定为《大洋深处钓鱼人》。直至2019年1月4日，《大洋深处钓鱼人》首映。但上院线的成本太大，这部被评选为“2019年优秀国产纪录片”的电影走进了农村院线平台，并在中国纪录片网、央视影音等处展播。

“为了它，赔了130万。”井建民感慨，“拍纪录片不挣钱，我也从没指望它挣钱，我只是想记录这个时代，把影像留给这个世界。”

反复回味大洋之旅，井建民发现，“南大西洋之行，是我人生的一场顿悟，同时也让我留下了很多遗憾。”他开始怀念仍在大洋深处的那帮兄弟，忍不住蠢蠢欲动，“是不是再去一趟？”不久后，这个疑问变成“必须再去”。

这一次，井建民把题材定为印度洋上的金枪鱼。在威海市委宣传部的协调下，荣成的靖海集团伸出了援手。

征途再启——

从“我是导演”到“我是渔民”

2019年12月25日，井建民的新片《大洋钓鱼记》开机。“金枪鱼的一生都处于游动状态，金枪鱼钓鱼在作业时也是不能停的，所以这次取名叫‘钓鱼记’。”井建民说，开机当天，包括他在内的5人摄制团队随“鲁荣远渔267”“鲁荣远渔268”两艘远洋渔船驶往印度洋。

“这次是全程在船上。我们带了17套摄影设备，分两组，一组跟拍‘267’，另一组跟拍‘268’。”井建民说，“我们5个人里有3人去过大西洋，有经验。”

井建民所在的“鲁荣远渔268”上有23名船员，大多数没有出海的经历。起初一段时间，来自天南海北的他们会很快熟识，相互闲聊各自的故事，聚在一起乐乐呵呵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除了工作，船员们又只剩下无聊，相互之间的聊天渐少，有时面面相觑却无言，各看各自的影视剧，或独自抽着烟望着大海发呆。井建民说：“渔船与渔船之间，船员与船员之间，因为作业环境的特殊而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和情感联系。”

印度洋不像大西洋那样每天都风起云涌变幻无常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在阳光和蓝天的映照下美得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。“每一帧画面都可以当做屏保”。

进入印度洋后，“鲁荣远渔268”与“鲁荣远渔267”因通信设备故障失去联系，“听说267船的位置有台风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”，井建民说。后来，摄制组安全会合的时候，井建民抱着同伴情绪一度失控。

工作依旧是劳累的。“鲁荣远渔268”选定一个起点，按照“U”字型航行，边走边放线，线的长度有130公里。放线往往从凌晨3点开始，持续到中午12点到13点，放线结束，也就意味着船到了“U”字型航线的尾点。随即，“鲁荣远渔268”驶往起点，浮漂中的电子定位装置能让渔船准确无误地找到它。到了起点，便是收线过程，转动的轮机拖拽绳索上船，摘卡、收线、拖鱼……为了保鲜，金枪鱼一上船，要在短短几分钟处理，随即被搁入-60℃的超低温冷库中储存。

金枪鱼作业也需要看运气，有时放收线一次，能钓100多条鱼，有时也只有二三十条，偶尔也能钓到两百多公斤的鱼，大多是几十公斤的。

“触目惊心。”井建民说，收线是高强度作业，需要团队跟船速配合，更因为是人配合机器的速度，任何一个环节稍有差池就会断线甚至伤人。

金枪鱼无论放钩、收钩都是在行驶中进行，船头风浪会迎面扑来，一台十几万的摄影机就这样被打翻报废，一台大疆航拍机也在印度洋上撞船沉海，一台小型水下摄像机撞碎进水。

井建民一行提前返程，就是因为一名船员受伤。那是2月8日，“鲁荣远渔268”接到通报，“鲁荣远渔876”上有名船员受伤，为了防止伤口感染，需要载送他上岸。此时，拍摄任务已经结束，井建民立即决定搭乘“鲁荣远渔876”回国。

海上搭乘的耗时之久远远超出想象。当时，“鲁荣远渔268”在东经90°、北纬23°附近，三天后，他们才等来了“鲁荣远渔876”。乘坐上“鲁荣远渔876”后，集合的消息也同时发给了“鲁荣远渔267”，两船对开了一天，才在大洋上相会。待人员集结完毕，“鲁荣远渔876”全速北上，于10天后抵达斯里兰卡附近海域，在此等候了5天，才等来了回国的运输船。好在运输船的速度快，他们终于在3月9日回到了荣成。

上了妻子的车，井建民第一句话是“下次去，会比这次更有经验”，妻子有点匪夷所思，井建民也觉得莫名其妙。

5个月后，他再次来到靖海码头，看到归来的远洋渔船时，内心又勾起了再次到大洋的冲动，他说：“我感觉我就是渔民。”

对于这部《大洋钓鱼记》，井建民很有信心，“我们纪录片记录的就是真实，所以每一帧画面都弥足珍贵”。“计划在明年春天就把它推出来，让人们尽快地看到远洋捕捞作业的宏大与艰辛。”井建民说，他在剪辑时充满了感情，“大洋之旅之于我，就像一场修行，对海洋的敬畏，对生命的思索，我想把这些思想融入片子”。

《大洋钓鱼记》尚在剪辑过程中，井建民又整装待发。11月中旬，他将带领摄制团队再赴印度洋，拍摄灯光围网捕捞船。“计划是两个月到三个月，但愿一切顺利。”井建民很感慨，“远洋里，只有可能怎么样，没有确定一说。”同时，到威海拍摄中国远洋渔业基地的计划也已经基本确定，“明年夏天”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“大洋之旅之于我，就像一场修行，对海洋的敬畏，对生命的思索，我想把这些思想融入到片子里”。“我要拍遍三大洋，拍遍所有的远洋渔船作业方式，记录这群勇于征服大洋的人。”这就是井建民。

为了理想—— 抛家舍业，远涉大洋

从实现梦想的角度来看，井建民的人生从不惑之年才拉开帷幕。

43岁从电视台辞职，放弃了编制和优渥的生活，开始经营山东火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火龙传媒”）。三年后，公司凭着一些作品接连斩获各项大奖，在业内声名鹊起，经营走上正轨。做海洋题材的纪录片，这个一直萦绕于井建民心头的梦想，又一次破土而出。

威海是渔业强市，渔业既是传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。威海远洋渔业始于1991年，目前的作业海域已拓展到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三大洋。全市拥有远洋渔业资格企业25家，占全省的61%；远洋渔船总数达到361艘，占全省的66.7%。

眼见着远洋渔业发展日新月异，但远洋渔船上的渔民却被忽略，井建民最终决定“用镜头关注远洋渔民这个群体”。

远洋拍摄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，而且风险巨大。在此前的纪录片领域，反映渔民生产的影视作品也仅限于近海捕捞作业。“不是我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，而是根本就没有渔业公司愿意配合我们。”井建民说，他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压在心里，“反复畅想，憋得难受”。

2015年的一天，威海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到火龙传媒考察时，与井建民畅聊一番。出乎井建民的意料，他的这个畅想得到了宣传部领导的重视。“没多久，就给我们联系了一家远洋渔业公司，让我们双方谈一谈。”

支持大洋之旅的公司是威海荣玛渔业有限公司，该公司的远洋就钓鱼船“鲁威远渔979”在当年10月份即将前往南大西洋作业。商谈异常顺利，荣玛渔业全力支持，双方很快就确定了往返路线、时间、拍摄内容。踌躇满志的井建民，马上手准备，“先是从公司的摄影师里挑了4个勇敢的小伙子，然后一起研究远洋渔业，对困难进行预估，写脚本……”

先期拍摄已经开始，噩运却接踵而至。弟弟因工伤住院，最终不治身亡；老父亲因阑尾炎住院，此时妻子也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。大洋之旅是否还要继续？井建民犹豫了。病床上的妻子说服了井建民，“去吧，机会难得”。

万里行程—— 海陆之别，生死一线

2016年1月21日，井建民一行在北京乘飞机，经法国、阿根廷辗转，最终抵达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。拍摄对象“鲁威远渔979”已经于2015年10月30日从威海石岛港出发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南大西洋作业区。摄制团队要在蒙得维的亚港搭乘荣玛渔业的“鲁威远渔919”，待驶抵作业区后再到“鲁威远渔979”上拍摄。

南半球的夏天绚烂多彩，异国风情令人目不暇接，看到70多米长、11米宽的“鲁威远渔919”停在岸边，井建民一度觉得之前对困难的预估有点过头了，“那时候，就感觉要坐游轮出海玩一圈一样。”上船几小时后，井建民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愚蠢。

渔船都是成对出海，远洋渔船也是如此。当地时间1月28日11点半，“鲁威远渔909”和“鲁威远渔919”结伴起航。仅仅半小时后，海呈现给人的不再是岸边驻足时看到的梦幻之美，而是深深的恐惧——一面天四面水，脚下的船就是世界的中心，“再大的船，在大洋深处也是沧海一粟”。

风浪新大，晕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。除了常年在太平洋上漂泊的船长、大副等6名职业船员，28名船员都是首次到远洋上来的新手，且大多是内陆人。摄制团队更是悉数难免，再也没人去甲板上看风景，况且除了云头就是浪花，也没什么可看。躺在各自的床铺上，每人把住一个桶，不时翻身起来哇哇地吐。“有的一晕就是两三个月，那滋味可不是人受的”。

16时许，船突然停了。见船员四处奔走忙碌，井建民觉得“来戏了”，他喊起了同样头昏脑胀的同事们，拿起设备就拍。多时后，井建民才知道，因为“鲁威远渔919”偏离航线，触底搁浅了，无法行进。“这么深的海里还能触底？”井建民诧异不已，他眼见着包括肉、菜等生活物资在内的很多东西被逐个抛进海里，更是感到不安和恐惧。船被减负，逐渐上升，才得以脱身。

同舟共济，在远洋渔船上根本不需要解释。井建民在恐慌的时候，忍不住去看船长，“他一脸镇静，我们就放心。”所有人都是如此，因为船长不仅是船上的最高统帅，更是船员们的主心骨。

而在当夜11时许，“鲁威远渔919”的发